

名家讲
现代中国

延请海内外学界名家，或写人物之精神事迹，或作专题之研习探讨，讲述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诸方面之问题，希冀于传承学术之同时，专家之学识亦可藉以略达于公众之平常感知。



觉世与传世

——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夏晓虹 著



近代这个激烈动荡的转折年代，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们。当年多少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早已被人遗忘，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已烟消云散，只成为历史家的研究对象；可是，充满矛盾的梁启超还活着，起码他的追求、他的苦恼和欢乐仍萦绕在今天的文学家心中。



中華書局

名家讲现代中国



觉世与传世

——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夏晓虹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 夏晓虹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名家讲现代中国)
ISBN 7-101-04839-0

I. 觉... II. 夏... III. 梁启超 (1873~1929)—
文学研究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5700 号

书 名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丛 书 名	名家讲现代中国
著 者	夏晓虹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 zhbc. com. 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55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839-0/K·2079
定 价	32.00 元

丛书缘起

晚清以降之中国，欧风东渐，旧学新知，自思想潮流至世态人心均为之一变，此自应为现代中国之滥觞。而后时移物异，历百年沧桑而至于今日，变化者不知又几何矣。《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中华书局延请海内外学界名家，或写人物之精神事迹，或作专题之研习探讨，讲述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诸方面之问题，辑为丛书，希冀于传承学术之同时，专家之学识亦可藉以略达于公众之平常感知，深祈学术界、读书界多所襄助。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 年 9 月

新版序

在我的学术履历中，《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1982年，当我跟随导师季镇淮先生开始研习近代文学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学界还相当寂寥。孟祥才编著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读来虽觉保守、陈旧，却是其时国内出版的惟一一本最为详细且最具学术性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里，所能参考的文献便极其有限。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8月，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分别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时，那份“天助我也”的喜悦。虽然两书印数均有五六千册，可放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实属微不足道。为确保捷足先登，我不仅动用了已从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当时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退休的妈妈的关系，劳动其先前的同事直接从内部购书；并且恳请刚刚从王府井书店转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归来的哥哥立时再走一遭，替我抢买下那部厚重的年谱。如果说，学术研究不只需要勤奋，也需要机遇，那么，当年我选择这样的论题也还算是适逢其时。在勾勒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

与“新文体”所受日本明治文学的影响时，这两部及时到手的书无疑对我大有助益。

毕业留校，一向关照提携我的张少康老师，又先后两次约我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论文，使我得以在刚刚起步的方向上继续用力，并在反复阅读与写作中，不断推进与完善对于梁启超文论的理解与论述。其中稍晚完成却出版在先的一篇，即收入《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梁启超》一文，显然比早些时候写出的《梁启超文艺思想刍议》论说更为成熟。此文因而直接成为本书的第二章。

关于梁启超“文界革命”论的考察既已拓展到其整体文学观，追索前后期思想的演变，梁启超对传统文学观念从反叛到复归的内在理路，以及其前期与日本明治文化与文学的深层关系，便相应地进入我的视野。其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日文本收藏，特别是其中的《近代文学评论大系》、《日本近代文学大系》以及《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三套大书，为我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与思路落实上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阅读中时时涌起的“发现”的惊喜，使原本相当艰辛的论文写作也充满了快感。

“好风凭借力”，我仍然要感谢这期间出版界的眼光与识断。李国俊所编《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及时印行，我很快就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购买到一册。在其中，我查出了梁启超曾给德富苏峰写过两次信，联系到梁氏提出“文界革命”时，正是以德富苏峰为楷模，声称其著作“余甚爱之”，则这一线索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而在1981年中华书局作为“内部发行”读物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我又意外地看到《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文。如此，依据梁启超的自白与同时代人的证言，梁之“新文体”与德富苏峰的“欧文直译体”之间的关联于是在我的眼中清晰呈现。

为了论著的相对完整，其后，我又补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小说与诗歌研究的两章，最后完稿的是“导言”与“结语”。1988年4月，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第一本书画上句号了。书名确定为“觉世与传世”，自以为对于凸

显论述主线，颇具画龙点睛之效，而此则有赖于平原君的一锤定音。

此书当年即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持的“人文研究丛书”第二批书目中，原以为出版会很顺利。殊不料1989年春夏间的一场风波，使这套书也受到牵连，暂时搁浅。经历了一波三折，总算在交稿三年以后，拙著才得以在原先落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样印出。而政治之足以左右学术的命运，令人慨叹。彼时尚不时兴编辑在版权页留名，我只记得责编与我同姓，工作认真负责，我对他十分感激与尊敬。

1991年8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出版以后，在国内研究界受到相当关注。而更大的反响来自日本。书中以将近一半篇幅讨论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深刻影响，引起了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接连在《北海道新闻》与《东方》月刊发表书评，以“探寻近代起源的实证比较文学研究”（《东方》1992年10月号）为题，揭示本书的独特价值。紧接着，1993年4月，以共同研究闻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也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倡导下，组成了“梁启超研究班”。这一共同体的研究结晶，即是1999年在日本出版的《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关于该项研究的缘起，狭间直树教授自承是接续包括拙著在内的“深入挖掘日本与中国之间文化影响关系层面”的研究成果而展开：“共同研究以‘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为题，将视点设置在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上。”（《序文》）应该说，能够引发日本多学科学者对梁启超进行深入研究，自然使得刚刚踏进学术研究之门的笔者备感鼓舞。此外，神戸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也在研究生课程中，对本书做了专门研读，参与此课的学生逐章译注的细节虽不能详知，但相信对于拙著必定补益良多。

实际上，在本书新版的修订中，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上述日文著作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最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笔者于第五章论述梁启超的新体传记文时，原先直接引录了《罗兰夫人传》中“河出伏流”一节文字，以为梁文中“有

些议论甚至是作为全传的核心思想提出的”之范例。而参与“梁启超研究班”的松尾洋二先生，则在其提交的《梁启超与史传》一文中指出：“夏晓虹所引用的地方，是罗兰夫人传的高潮之处，同时也是全传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传记的中心思想。但是，夏晓虹未曾提到这里的内容其实是梁启超翻译德富芦花所编传记而来的。”松尾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梁启超如何取材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法国革命之花》，其有所删改而隐去翻译痕迹的《罗兰夫人传》后来又如何流传到朝鲜，出现了朝文译本，并由此钩稽出一条近代东亚精神的历史交流渠道。此一梁文原始出处的揭示足以纠正笔者先前的误会，这次整理时，便依据其说做了相应改订。

不过，因为此书整体上仍属于旧作重印，对书稿正文的修整因而仅限于个别字句。即使如松尾洋二先生的指正，由于并未影响到主要结论，故也只放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大体而言，我的工作主要是核对引文，补充注释，以使之更加准确与详明。

遵照编辑的意见，我选择了一些相关图片配置书中，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历史场景与增加阅读兴味。毕竟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距离今日已经有一个世纪。

2005年5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夏晓虹，1953年出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在吉林插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1984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学术著述之余，间或发表文化随笔。

著作除本书外，尚有《诗界十记》（1991）、《晚清文人妇女观》（1995；日译本名为《纏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1998）、《旧年人物》（1997）、《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1998）、《晚清的魅力》（2001）、《晚清社会与文化》（2001）、《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2002）、《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004）；并主编“学者追忆丛书”、《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编校《梁启超文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追忆康有为》、《追忆梁启超》、《〈女子世界〉文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等；另有合著《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同学非少年》，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大旧事》、《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等数种。

名家讲现代中国

钱理群 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

耿云志 胡适生平思想十八讲

夏晓虹 觉世与传世

——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罗苏文 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

欧阳哲生 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肖东发 近现代出版文化十二讲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封面设计 陆智昌

目 录

新版序	1
第一讲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1
第二讲 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 ——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	13
第三讲 “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小说研究	39
第四讲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启超诗歌研究	74
第五讲 “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梁启超“新文体”研究	105
第六讲 反叛与复归 ——梁启超与传统文学观念	143
第七讲 借途日本 学习西方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	169
第八讲 “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	192
第九讲 “欧西文思”与“欧文直译体”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	225
第十讲 结语：“但开风气不为师”	260
附录一 梁启超学术年表	274
附录二 梁启超著述要目	280
后 记	285

第一讲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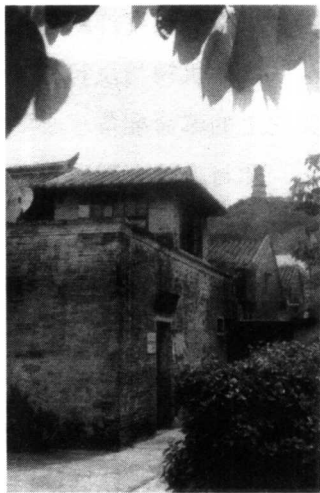
一

在《三十自述》^[1]中，梁启超曾这样记述他的出生：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把自己的出生时间与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既有炫耀新知识之心，更有一种自觉处于国内外风云交汇之际，因而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庄严意识。的确，时代给予梁启超以机会，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者家庭，十八岁以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沿着前



广东新会梁启超故居

[1]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代读书人的老路走下去，他的前途不外科举仕宦或积学能文二途。然而，梁启超是幸运的，他躬逢良时，又躬逢得风气之先的良师康有为，再加上他个人的聪慧异常与生性喜新，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出将入相、宿儒才子完全不同的路。

这个玉成梁启超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充满了苦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在列强势力包围中的中国，面临着弱肉强食的瓜分危险；腐朽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则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不学习西方进行变革，就要亡国，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梁启超生当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他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猛烈攻击顽固守旧派，宣传西方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学说及其他科学思想，给沉闷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新生气。无论其说是否粗疏浅陋甚至多有错误，也无论其人的政治立场为保皇、改良抑或其他，梁启超大量著述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发起人们对清政府的仇视与反抗情绪，加速了新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从而为政治上、文化上的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和封建社会同样悠久的封建文学，到晚清也失去了光辉，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改良文学随之兴起。作为这一文学运动领袖的梁启超，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虽然文学改良运动是与政治改良运动相辅而行的，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未获成功，而他所发起、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

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研

究这一段的文学或文化，便不可能越过梁启超。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1]，其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揭示梁启超的矛盾与困惑，因而成为本书的重点。

二

梁启超参加过科举考试，却成为一个长期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政治家；他出身旧学，却以新学家而闻名。这种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使他的矛盾与困惑也带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

还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便与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古文翻译家严复发生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继续到《新民丛报》时期。

严复 1897 年的原信现在未发现，不过，据其后来自述及梁启超复信中所述，是他以为梁启超发论草率，因而“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2]。梁启超私下虽然承认严复所说未尝无理^[3]，但在回信中仍然申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按：指《时务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

[1] 就其随时进步而言，梁启超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故可以完整反映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历程。而康有为、严复、林纾、章太炎等人便不具备这种完整性。

[2] 严复《与熊纯如书》(39)，《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致康有为书》（1897年4月4日）：“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1]

到《新民丛报》创刊，第1号便发表了梁启超为严复的《原富》译本所写书评，极称其“精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此书的不足：

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

梁启超认为：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据此，他批评严复的译笔古奥，不能使学童受益，而主张进行“文界革命”^[2]，改变这种状况。严复私下也表示对梁启超的批评十分感佩^[3]，不过，在复信中仍固执己见，声称：

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4]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黄遵宪，他在致严复的信中，与梁启超相呼应，针对严复“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的观点提出：

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5]

概括而言，这场由当时几位著名人士参加的论争，并非个人间的意气之争，而是一场意义深刻的严肃讨论，其基本论题即为作“觉世之文”还是

[1] 《与严幼陵先生书》，《文集》第1册。

[2] 《介绍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原文未署名，应为梁启超所作。

[3] 《与张元济书》（14）：“《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严复集》第3册，第551页）

[4] 《与梁启超书》（2），《严复集》第3册，第516—517页。此信原载1902年5月《新民丛报》第7号，题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

[5] 《致严复书》（1902年），《严复集》第5册，第1573页。

作“传世之文”。这不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作文态度，而且集中表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与追求。

梁启超的一生大体可以1917年底脱离政界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政治家而兼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后期则以文学及其他学科的专门学者而兼评时事。与严复的论争尽管发生在前期，却正可以作为考察其文学观念变迁的重要线索。

这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重要课题。甲午战争使改良派取代洋务派走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与宣传家，也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政治生涯。由洋务派的“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改良派的“从制度上感觉不足”^[1]，改良派已认识到国民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从而把“新民”放在首位，而以开通民智、变法图强为基本政纲。因此，从投身政治活动起，梁启超即自觉地以“觉世”为责；即使治学，也念念不忘“学者以觉天下为任”^[2]。有“思易天下之心”^[3]，作“觉世之文”而不作“传世之文”，可以说是梁启超前期著述的宗旨。

在梁启超看来：

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4]

梁文受人称赞处，恰在流畅锐达、条理明晰，正是标准的“觉世之文”。而在近代报业兴起的背景下，“觉世之文”又以载于报刊功效最著，于是报章文体便与著作文体有了明显区别。用梁启超的话说：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5]

[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文集》第14册。

[2]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文集》第2册。

[3]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集》第3册。

[4]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5] 《敬告我同业诸君》，《文集》第4册。